

# 評《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張隆志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蕭阿勤、汪宏倫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專書第 11 號，2016 年，466 頁。

本書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自 2010 年成立以來的集體成果，也是台灣社會科學界自 1990 年代出版《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張茂桂等 1993）以來，關於此一重要領域的代表性學術論著。茲條列各章主題及作者如下：

導言：族群化、國族化的政治、文化與情感（蕭阿勤）

第一章：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吳叡人）

第二章：反思台灣威權時期僑生政策的形成：以 50 年代為例（黃庭康）

第三章：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重探龍冠海與「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蕭阿勤）

第四章：由「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論台灣外省人族群意識的內涵與緣起，1970-1989（王甫昌）

第五章：從頭人家系到斯卡羅族：重新出土的族群？（林開世）

第六章：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原住民 DNA、台灣人起源與  
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蔡友月）

第七章：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  
架（汪宏倫）

結語：對「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省思（汪宏倫）

全書七篇專論分別探討 1945-1950 年間的國家認同競爭，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的海外僑生政策，1960 年代流亡知識分子的歷史敘事，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外省人集體認同的質變過程，1990 年代以來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政治，晚近台灣的生物基因科技與族群國族認同的共構現象，以及當代中國的新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編者蕭阿勤在導言中指出本書在方法論上的四項特徵：一是建構論的立場，二是歷史性的強調，三是對菁英角色的分析，四是對語言、論述及敘事面向的重視。而共同編者汪宏倫在結語中亦強調本書對於歷史脈絡及時間縱深的深度分析，並說明其對於質性研究方法，以及知識論與實踐倫理的主張。茲提要介紹各章要旨及特色如下：

吳叡人從歷史結構論及菁英動員理論的觀點，討論戰後初期兩次政權轉移期間，台灣所出現的紅色中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灣獨立（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等「三個祖國」的認同動員與競逐。他指出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及東北亞的新冷戰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封閉了歷史的隙縫，並導致「中華民國在台灣」新穩定結構的出現。此一重要的個案，不僅有助於戰後初期台灣史實的重建，更提供了理解台灣政治史的新視角。

黃庭康對於威權時期台灣僑生政策形成過程的歷史分析，除了指出國民黨內部各部門間的差異性，更呈現出從國民黨到行政院各部會，以及各大學間不同場域行動者的複雜互動。他進一步討論 1954 年中美防禦條約簽訂後，美援對僑生政策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及轉折。本研究除提供台灣僑生政策的新個案，更從國家內部的多元性觀點，指出不同部門行動者間的複雜角力過程，有力地批判對於過去國民黨及

其統治集團共同利益的同質性假設。

蕭阿勤結合歷史脈絡及文本分析取徑，重建戰後台灣社會學奠基者龍冠海橫跨中國、南洋、美國及台灣的生涯軌跡。作為流亡知識分子的龍冠海，他的心路歷程與學術實踐如何呈顯出戰後台灣外省族群的集體認同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霸權。作者在此一學術史個案中，除延續其近年來致力從事的世代認同研究，更對於敘事研究被時間社會學者乃至實證社會科學界長期忽略的現象，提出反思及呼籲。

王甫昌是本團隊曾經參與《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一書的跨世代作者。他透過戰後台灣選舉制度及政治權力分配的比較分析，指出外省人作為主要的社會分類範疇，是外省第二代菁英政治動員論述的產物。在 1970 年代前外省移民的主要認同，仍以中國各省分縣市的地域意識和原鄉組織為主。相較於作者早期的族群研究作品，此一綿密的「族群化」研究個案，除了提供政治社會學分析取徑，亦凸顯出當代台灣「四大族群」論述的歷史性。

林開世是本團隊裡面唯一的人類學者，他結合 19 世紀後期的中外歷史文獻、日治時期民族誌調查資料及當代屏東滿州鄉的田野調查紀錄，重新解析恆春平原「斯卡羅族」在官方報告、學者研究及民間記憶中的複雜歷史風貌。他指出「斯卡羅」並非當地人生活中的分類範疇，亦不必然具備族群概念的內涵。他認為當代「斯卡羅」論述，其實是認同政治及尋根運動中被發明的傳統。此一深度個案分析及其批判觀點，實值得族群研究者加以深思。

蔡友月從科技與社會研究取徑，討論「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科學論述的興起及其爭議，並反思基因研究在族群與國族認同政治中的角色。她指出過去科學決定論跟社會建構論典範的限制，並從內參與外溢的視角，討論實驗室科學知識與社會人群分類知識間的鑲嵌與共構關係。更結合學術文獻、媒體報導及口述訪談，分析當代平埔基因研究與台灣國族血統論爭的複雜脈絡，從而提出「反身性的生物社會性」概念，作為面對族群政治生物醫學化現象的重要主張。

汪宏倫討論當代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與民間大眾民族主義的關連。

他指出，新中國的「人民」概念打造，歷經 1949 年中共建國後毛澤東的戰爭、共產主義及文革運動的恐怖暴力。在 1978 年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後革命時期，情感結構轉變為被害悲情的論述修辭。此一「戰爭／鬥爭之框」在 1990 年代隨著官方愛國主義的提倡，在全球化時期更加高漲。本文結合制度、情感結構及認知框架的多層次分析，為民族主義及戰爭遺緒等重要課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案例。

整體而言，相較於 1990 年代的族群與國族認同研究，本書作為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及歷史學的跨領域學術共作的研究成果，具體反映出二十多年來台灣人文社會學界文化轉向的趨勢影響。各章內容涵蓋了殖民統治、流亡敘事、冷戰體制、美援與僑教政策、生物醫學與基因科技，以及認同情感結構及認知框架等多元豐富的視野，呈現了新世代學者在開拓研究議題與視野上的進展軌跡。以下試針對本書內容及研究取向，提出個人觀察與反思：

(1) 人群分類觀點的差異：本書雖為集體研究成果，但七位作者對於族群及民族作為分析單位的認知取徑並不相同。如蔡友月以當代台灣四大族群為對象，討論社會認同的生物醫學化過程；王甫昌從族群化的角度，說明外省人族群意識的歷史背景與政治過程；吳叡人、汪宏倫從民族主義研究的理論視角，分析戰後初期台灣與當代中國的國族認同現象；蕭阿勤以個人生命史的敘事分析，反思外省人第一代知識分子的集體認同與中國情結；黃庭康討論僑生政策，聚焦於國家內部的多元行動者間的競逐與互動，但並未處理族群與國族認同議題；林開世從在地觀點，質疑斯卡羅人作為族群實體的假設，並指出「番」作為人群概念在民間日常生活中的流動性及社會意涵。上述差異除了反映作者群的不同學術傾向外，亦顯示出本團隊面對當代族群與民族主義研究的複雜內涵，仍待提出更具整體性及解釋力的分析架構及理論見解 (Brubaker 2015)。

(2) 單一現代性的理論假設：蕭阿勤在導言中，從全球現代性的觀點，指出台灣族群、民族與國家統治等現象，是源自於 18 世紀末至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並援引學者 Roger Brubaker 的近作，

主張從單一現代性的角度，強調全球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過程的相互關連。而與我們有關的族群、民族、國家等信念、記憶、盼望與情感等，都是此一源自於歐洲的現代性產物全球擴張的結果。然而，關於單一現代性論點所隱含西方中心論假設及其傳播論色彩，近年來已經受到後殖民研究及比較歷史學者的批評。國內社會學界亦曾針對台灣現代性課題，從歷史與理論角度進行研討。在強調全球視野與跨國連結的同時，如何超越過去現代化論及西方中心論的限制，提出兼顧整體性及多元性的替代性主張，仍有待本團隊成員從經驗及理論角度加以闡述（黃金麟等 2010）。

(3) 資本主義分析的忽視：本書作者們基本上是以族群認同與民族主義的政治社會學，以及文化論述分析為主要重點。並未涉及相關課題的社會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面向。換言之，相較作者們對於現代國家與民族主義等議題深入探究，資本主義分析作為現代性研究的重要面向，在本團隊的研究議程中似乎完全缺席（本書索引中亦無此關鍵詞！）就此點而言，近年來台灣學界對於戰後台灣經濟史的論辯，乃至於新自由主義秩序與當代社會文化的探討，均有嶄新研究成果。未來如何從經驗及理論視角，回應經濟因素對於當代台灣與中國族群、民族及現代國家的影響，以及階級與性別等範疇對於族群研究的重要性。應可作為本團隊進行後續研究討論的核心課題之一（黃應貴 2012）。

(4) 空間研究面向的缺乏：本書在分析上的首要特色，是對於歷史脈絡及時間縱深的重視。尤其是各篇作者以 1945 年到 2015 年期間為主軸，對於台灣及中國戰後歷史發展過程所進行的個案考察，提供讀者更為動態的理解，亦有助於將台灣的特殊經驗及其理論意涵，帶入國際學界的討論議程。另一方面，雖然各篇作者均意識到台灣與周邊區域的歷史關連（從帝國夾縫、流離經驗到科學社群），但是，相較於對時間向度及人群分類議題的細膩討論，空間面向似乎僅成為本書的背景。未來如何將台灣學界的空間研究成果，帶入當代認同政治與現代國家治理的討論，應值得本團隊在後續研究討論時予以參照（王

志弘等 2011)。

(5) 性別研究觀點的可能貢獻：性別研究是當代人文社會學術的重要領域，對於族群關係、國族認同及現代國家治理等議題，均有批判性的創新見解。本團隊成員中專攻社會運動及性別政治的學者范雲，此次並未收錄其論文。而蕭阿勤對於龍冠海國族敘事的討論，亦曾徵引社會學者趙彥寧對於男性流亡者與女性敘事的分析。未來如能加入性別面向的討論，應可深化對於國族想像、公私領域及現代性等重要議題的討論（趙彥寧 2001）。

(6) 現實關懷及反身性立場：本書在論述上的重要特色，是作者們的現實關懷以及反身性立場。如同編者所言，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議題與當代台灣的現實情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圍繞著國族認同、族群正名、歷史認識、戰爭記憶乃至生物基因庫等問題的論爭與衝突，迄今仍舊方興未艾。然而如編者汪宏倫所言，族群與民族主義學者在面對台灣的國族困境，以及現實政治交混糾纏的難局時，並不容易區分「分析的範疇」與「實踐的範疇」。學者除以制度論觀點及反身性思考立場進行介入外，如何將寬容與接納的美德帶入陷入對立及仇恨的個人與社會之中，應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公共性議題及挑戰（汪宏倫 2014）。

誌謝：本文改寫自 2016 年 11 月 27 日東華大學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新書發表會發言稿。筆者感謝蕭阿勤、汪宏倫的邀請，以及陳靜玉、魏龍達的協助。

## 參考文獻

- 王志弘、陳羿伶、李素月、蘇育賢、李秉霖、李家儀、趙珮伶、郭芷余、程彩倫、張立本，2011，《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台北：群學出版社。
- 汪宏倫編，2014，《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茂桂、吳乃德、王甫昌、林忠正、林鶴玲、陳茂泰、劉文雄、黃應貴、蔣斌、石磊、瞿海源、洪鎌德、胡台麗，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
- 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2010，《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北：群學出版社。
- 黃應貴，2012，《「文明」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趙彥寧，2001，《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Brubaker, Roger. 2015. *Grounds for Differ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